

29岁的“剩女”袁梦琳开始感到,一天不结婚,成为“剩女”的压力就会不断地侵蚀自己的精神防线,而最近时不时收到的婚礼请帖则让她愈发焦虑——

谁在制造“剩女恐慌症”?

本报记者 王维砚

“29岁,一个不上不下的年纪,青春渐远,对白马王子不再抱有幻想,因为‘单着’而淡定不能的熟女时期。”日本作家石田农良在小说《我们是不是该结婚了》中的描写恰好戳中袁梦琳的痛点。

是的,29岁的“剩女”袁梦琳开始感到焦虑。“25岁之后的每一个生日都带着淡淡的哀愁,这种情绪在29岁达到了峰值。”父母的逼婚压力和“看条件”的婚恋市场让袁梦琳患上了剩女恐慌症。

“剩女”是对大龄单身女性的贬损与污名化,其本质是社会基于传统性别角色与分工针对大龄单身女性制造的“恐慌”。是从男性选择的立场否定独立女性的自我价值。”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部助理研究员孙卉卉对记者说。

采访中记者发现,在商业资本和社会舆论的包围之下,大龄单身女性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精神挤压。不过,即使“被剩下”,也不“被左右”,她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想让压力遥控了自己对未来的选择。

姑娘,你被剩下了

18岁考入北京一所重点大学中文专业,22岁被保送读研,25岁顺利进入一家事业单位工作,并获得北京户口。袁梦琳按照父母“在什么年纪做什么事”的嘱托进阶着自己的人生,然而,身为“优等生”的她却在恋爱结婚这件事上被“卡”住了,沦为婚恋世界里的“差等生”。

工作后,袁梦琳开始了漫长的相亲。4年间,她参加过各种类型的相亲活动,相亲对象接近30个。为了提高相亲成功率,她像从前准备考试那样阅读各种相亲攻略,并认真做

好笔记。为了和相亲对象找到共同话题,她甚至开始关注自己原本并不感兴趣的足球、篮球以及赛车。“这是双向选择的过程,你在挑剔别人,对方也在审视你。”袁梦琳告诉记者,相亲路上遭遇的故事堪比小说电影里的桥段。

在家人的帮助下,袁梦琳用按揭贷款的方式在北五环拥有了自己的一居室,工作上也小有成绩。然而,每次同学聚会上,朋友的一句“你结婚了吗?”就会让她的骄傲分钟被击碎,她觉得自己像个异类。袁梦琳形容这种恐慌就像是大家在一个考场上答卷子,身边的人都纷纷交卷离场,但是自己的试题还没有做完。

“一件标价899元的衣服,服务员说卖800多和900不到都是一个意思,但是你的心理感受却会不同。”对袁梦琳来说,29岁和30岁虽然只差一岁,但是意义重大,她担心过了30岁就可能被婚恋市场抛弃。

她感到,一天不结婚,“剩女”的恐慌就会不断地侵蚀自己的精神防线,而最近时不时收到的婚礼请帖则让她愈发焦虑。

社会舆论的挤压与包围

“高学历、高收入、高年龄的一群在婚姻上得不到理想归宿的大龄女青年。”这是国家语委在2007年发布的《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(2006)》中对“剩女”的官方解释,而在民间,剩女的界定则更为通俗,“凡是27岁以上还没有结婚对象的女人都叫剩女”。

在《中国剩女调查》一书的作者罗爱萍看来,“剩女”舆论喧嚣的背后,是一股强大又无处不在的资本力量,婚恋网站、电视相亲节目、影视传媒、情感专家、文化出版业等等,“凡是能和单身女性拉上关系的资本实体都在积极分享‘剩女’话题带



来的商业利益”,成功制造出全民催婚的舆论环境。

“剩女”这个词汇过于标签化,某种程度上夸大了恐慌情绪。”北大社会学博士、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社会学系教师陈文玲并不认可“剩女”的说法,她认为这种“贴标签”的做法是在人为强化对单身女性的精神挤压。事实上,单身女性面临的内心焦虑很大程度上正是社会舆论的合围造成的。

“在社会转型变迁的背景下,贫富差距

加大,生存成本提升,女性和家长往往对女性择偶条件提出了更高要求。”陈文玲分析说,在物质条件上相对高的门槛把很多不达标的男性排除在门槛之外。北京一家相亲机构的“红娘”向记者证实,有车有房,收入偏高的男会员确实非常抢手,而受欢迎会员的关键词则是“高颜值”、“身材好”、“90后”。

“女性群体自身的独立自主性不断上升,不同于母辈,她们并不完全将个人的幸福快乐与婚姻家庭绑定,也不完全依靠婚恋换取经济安全。”陈文玲认为,一些女性由于接受过良好的教育,对伴侣和婚姻生活有明确的期待,不愿选择将就。

大众传媒对一些单身女性励志故事和精彩生活的呈现,也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榜样作用,“女性对自我发展的期望值升高,婚姻对女性的诱惑力也就相应降低。”陈文玲补充说,由于80后90后父母一代的离婚率已经开始上升,原生家庭的影响可能会使一些女性对情感和家庭关系缺乏安全感,自愿选择单身。

数据显示,1990年至2010年的20年间,中国25岁及以上未婚女性增加了1000多万人。截至2015年,中国单身男女数已近2亿,主动选择单身的“单女”明显增多,独居人口从1990年的6%上升到2013年的14.6%。

逼婚、反逼婚与平凡的大多数

老家在山西太原的袁梦琳平均一周与家里通三次电话,而每一次的通话都会以“抓紧嫁人”为主题收尾。“学业和工作都可以靠自己拼搏和奋斗得到,但唯独爱情不行。茫茫人海,我找谁去奋斗,又到哪里去拼搏?”电影《剩者为王》里女主角盛如曦的这句台词让袁梦琳感同身受。

今年春节前夕,在北京直通地铁站出现了中国第一个反逼婚广告。海报上笑眯眯的圆脸娃娃抱着一颗硕大的爱心,爱心里是一封写给父母的信:“亲爱的爸爸妈妈别担心,人生有很多种,单身也可以很幸福”。

4月初,某护肤品牌推出广告片《她最后去了相亲角》,初登网络就迅速成为刷屏“爆款”。片中,几位大龄单身女性在上海人民广场的相亲角得到了父母的谅解。

“逼婚客观上会造成家庭代际关系的紧张,同时给未婚女性造成精神压力。”陈文玲分析说,目前出现的“闪婚闪离”现象与逼婚不无关系,而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对当事人、家庭和社会都会产生不利影响。陈文玲认为,被“剩下”是女性感情生活、工作和学业共同作用的结果,社会应该给每个个体提供平等、尊重、包容的环境,让每个个体自由地选择人生。

袁梦琳告诉记者,朋友在自己的生活中占据了重要戏份,形成了强大的情感支持网络,朋友的陪伴与聆听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伴侣的空缺。然而,在一个绝大部分人都要结婚的社会,即使旁人不刻意歧视,她也会面临友谊匮乏和被孤立的境地。

袁梦琳和她的单身闺蜜们清楚,自己既不是女权主义者也不是不婚主义者,在吐槽抱怨被催婚的压力过后,她们必须直面的仍是如何嫁人的问题。不过,袁梦琳们并不想让压力左右自己的未来。

(漫画 赵春青)

编读 e 时代

本报法人微博

网友留言摘编

(5月9日~5月14日)

【中消协曝光房屋中介四大问题】中国消费者协会4月29日发布《房屋家居领域投诉情况专题报告》,曝光了房屋中介四大问题,包括乱收费现象严重、存在霸王条款、资金监管过程中违规操作、隐瞒房屋真实情况。中消协建议房屋中介和工作人员应加强自身管理,增强服务意识和责任感。

(2016年5月3日《工人日报》报道)

@z531312762:

与其呼吁房屋中介加

强自身管理,不如制定行业规范,并加强监管,考核,接受主管部门和社会公众的监督。只有置身于阳光的监督之下,公开规范、透明管理,行业的潜规则才能越来越少。

【@Yhome 风景】:这些问题就是唯利是图的后果,得益的是中介,受损失的是消费者,重视并落实监管执法,真是刻不容缓!

【一位80岁留守老人的期盼】

80岁的高翠芝是北京延庆区大庄科乡慈母川村的一名空巢老人,子女均在外打工,很少有时间回来探望她。对她而言,最难的是做顿饭歇歇脚,一顿吃上两三天;最闷的是鞋垫越绣越多,却总盼不来人影;最怕的是孤独终老……

(2016年5月5日《工人日报》报道)

【@春天的春雨】:老人不需要得到很多,更多的是需要陪伴,常回家看看,做顿可口的饭菜,和父母聊聊天,出去开开心心的游玩,不要等到他们听不见、记不清时才想起这些!

【@语老李】:都说养儿能防老,可是儿女为了生计得四处奔波。上有老下有小的日子不好过。多互相理解,互相担待!

(宴菲涛摘自《工人日报》新浪微博)

欢迎读者到新浪、腾讯、人民网平台与《工人日报》微博互动

花溪农商行力推普惠金融助当地脱贫

本报讯(记者李丰)银行降低贷款利息、贷款门槛,且农民工最高可贷款50万元,仅此项政策,以花溪区100多个行政村测算,每年对农户贷款支持的优惠利率不低于2000万元,2015年以来,贵州省花溪区商业银行董事长吴勇和他的同事,在花溪区172个村设立普惠金融服务站,按照“一乡一特”的金融服务模式,大力支持当地蔬菜、精品水果、茶叶等特色种植业发展,形成农业产业化。

贵阳市花溪区石板镇的合朋村,此前村民多以种地为生,但由于村里土地石漠化严重,全村3000多名村民,一度有7成在温饱线上挣扎。2007年,贵州“小额农贷”的春风全面吹开,吴勇把他的公益情怀,首次融入到了脱贫攻坚工作的试验中。他对合朋村进行了长达半年的考察,经过协商,在合朋村成立了贵阳市合朋经济开发有限公司,以土地入股的形式,陆续开发平整土地,用于招商引资。

此后,吴勇专门带领团队驻村,将480万元贷款发放给全村农民,正是这笔资金,推动了合朋村的产业化进程。

如今的合朋村,已成了贵州知名的民营经济集聚地。村民人均纯收入从2009年不到3000元迅速增至2万多元,1000多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了业。

多年来,吴勇和他的同事们,把公益事业当作了重要职责,共同捐款成立了花溪农商银行爱心协会,奉献爱心,向贵阳市环卫工人节等公益活动捐款60余万元;向花溪区碧水蓝天行动捐助20万元;向贵阳“劳模示范林”捐款50万元;向贵阳市职工互助医疗基金捐款100万元……

“租房没有归属感,总觉得是异乡人”

——深圳几位“90后”的买房心路

远。

刚刚参加工作的90后,正在加入深圳购房大军,而这些购房款,大多来自于父母积蓄。

出生于1992年的张远告诉记者。刚毕业来深时,没有想过会在深圳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,一直在罗湖区租房住,“2015年房价开始涨了,五月的一天妈妈突然打电话问我,工资是否够付月供,如果我能够付月供,爸妈提供首付给我买房。幸福来得太突然,我在深圳终于可以有自己的家了。”回想起这一幕时,张远仍然满脸欣喜。

租房没有归属感,住在出租房里一直觉得自己是异乡人,而且月供比月租合算,这都是我和爸妈决定买房的原因。之后我就开始留意买房信息,放假甚至晚上下班都跟

房地产中介去看房。”

找合适的房子很辛苦,还得“啃老”,但她心里很清楚,在深圳有一套自己的房子,不仅意味着有了自己的住所,更让她内心觉得离这个城市更近了。

张远诉说起去年7月看的第一个楼盘,“那是我第一次走进售楼大厅,工作人员还领着我去样板间参观。89平方米的户型差不多4万元每平方米,约360万元一套,首付108万元,月供加利息是1万多元……”有了这次经历后,再看房她给自己定了个标准,首付30万元内,月供也要在自己能承受的范围内。

2015年下半年,张远到过很多地方看房,例如深圳的龙岗布吉、龙华五和、罗湖田贝,甚至和同事组团到东莞看房,被房地产中介骗去惠州看房等。“吸取前几次的经验

教训,我为自己看房定了标准,即首付30万元内,交通便利、有较大升值空间、二手过渡房,这样范围就缩小了很多。”她说道。

去年12月底,张远偶然得知一高中同学在深圳房地产公司工作。通过同学介绍,她决定买南山区西丽镇的一套31平方米的小区房,约3.6万元每平方米,总计近110万元,月供4000元。“买房后,才觉得在深圳真正有了归属感。”

和张远不同的是,出生于1991年的陈乾从小在深圳长大,算是深圳本地人。陈乾毕业于2014年,现在深圳一家房地产公司工作,负责城市更新项目,他也是去年在深圳买了房。“我也是在深圳长大的,两岁时便随父母从湛江来到这里,之后一直居住于此。”陈乾和记者说,“在坪山区的坪山镇,父母有一幢自建房,去年7月份,买了

一套89平方米的商品房,也要200多万元呢。首付60万元左右,供房每个月1万元,都是父母给的。刚出来工作,只能靠父母帮忙。

“坪山区算是深圳房价最便宜的地方了。去年年初时候坪山区坪山镇的新房,均价才1.5万元每平方米左右,7月房价还没完全涨起来,大概是2.2万元每平方米,而现在均价可能是2.7万元了。”陈乾告诉记者。

陈乾还说,刚工作时住在姐姐租的房子里。陈乾的姐姐是2014年7月毕业的,在深圳南山区蛇口工作,在工作单位附近租了间20多平方米的农民房,起初租金是每月2000元,2015年一年内租金涨了三次,每次上涨100元。

“房租涨了,后来就没有继续租了。租房住始终没有那么自由,当时涨房租也是有背景的,南山区的白石洲是很大的城中村,要进行城市更新,白石洲里的租户都要搬到别处去,因此附近的蛇口房屋出租就非常旺,租金也跟着上涨。”

不论是出于心理上的归属感还是出于理性的经济成本考量,在深圳不少像张远、陈乾这样的90后觉得,买房,是融入这座城市的不二之选。

南阳工务段为大调图“保驾护航”

本报讯 5月15日,全国铁路将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。为了确保大调图顺利进行,郑州铁路局南阳工务段从组织包保盯岗、加频检查次数、加强设备整治、刷新防护设施等方面入手,紧抓重点,盯控关键,确保新运行图顺利实施。

据悉,该段在调图期间,全体干部职工严格执行段、车间、工区三级值班制度,保持24小时不间断值班和不中断通信联系。同时,段领导班子成员、包保干部按照包保分工,深入到车间、班组包保检查,要求包保车间收集汇总当天检查情况,发现和解决问题情况,纳入问题库并限时处理。

(原双见 雷金定)

江山农商银行惠民再出新招

本报讯 近日,浙江衢州6家农信系统的负责人齐聚江山,学习观摩自助放款新业务,这是江山农商银行继推出惠民快车贷款外的又一惠民新招。

据悉,随着浙江农信电子渠道放款体系上线,客户通过手机银行、网上银行、自助终端等电子渠道即可办理贷款申请、贷款发放、贷款查询、贷款还款等业务,从年初至今,江山农商银行已发放惠民快车贷款1899笔,其中电子渠道放款1344笔,实现了老百姓在家就能贷款的梦想。

(王利)

兵团一师一团帮助困难职工

本报讯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一团从改进工作作风,拓宽帮扶渠道入手,创新工作方法,帮助困难职工。

该团工会把工作重点放在基层,切实做到改进工作作风,密切联系群众,深入基层单位和社区,细致开展调查,健全完善困难职工档案,增强困难职工帮扶工作的针对性,特别是将兵团环卫工人纳入困难职工档案并予以救助,受到了职工的欢迎。该团还通过知识竞赛、职工运动会、文艺演出等形式,积极宣传先进模范人物。

(张璇)

(上接第1版)

黄月英在村里的一家工厂当厨师。每到中午,她把工厂那边的饭菜做好,就立刻赶到村部的食堂打扫、做饭。她说,救援人员随时到,随时都能吃上热乎的饭菜,一天要做多少顿没法统计。9日3时许,一批刚换下来休息的武警官兵来到村部,黄月英等人马上就端来了热腾腾的面条。

每个人都磨烂了许多副手套

5月9日,记者在泰宁县看到,这里有不少喷有民间救援字样的车辆。据了解,参与救援的有厦门蓝天救援队、老兵志愿服务队等社会民间力量。

参与救援的蓝天救援队,有来自厦门、龙岩、三明、莆田的数支分队,31名队员奋战22个小时,协助清理出31位遇难者遗体。蓝天救援队的一名老队员告诉记者,他们首批队员5月8日22时抵达现场后,即加入救援,跟随消防部队的生命探测仪和搜救犬细搜深挖,当大型机械平整场地后,又用手将遇难者从废墟、泥潭中搬运出来。他们每个人都磨烂了许多副手套。

曙光救援队是此次救援中最先到达灾害现场的民间救援组织。“队员们通宵没合眼,就盼着能救出哪怕一个人……”一名队员告诉记者。

“那边就是。”厦门特勤二中队的中队长

看过牡丹集团的新型显示设备、智慧园区、园区多媒体电视台等展区,带孩子冒雨前来的一位女士说:“从小看牡丹电视,没有想到老企业现在这么‘炫’。很震惊,也很感动!”

在活动启动仪式上,来自北京公交集团的张鹏鸣等四位劳动模范代表首都国企发布了“国企承诺书”,承诺将继续弘扬国企的优良传统,勇于担当、爱岗敬业、恪尽职守,坚持改革创新、锐意进取,诚信立身,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中凝聚“中国精神,国企力量”。

“主办‘首都国企开放日’活动,其目的就是要敞开国企大门,向市民展示诚信、创新、拼搏、担当、爱岗、敬业、温暖、和谐